

博士后文库

大学的理想

价值取向及其言说立场与限度

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

Value Orientation, Standpoint and Limitation

◎ 陈廷柱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博士后文库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04SJD880050)

大学的理想

价值取向及其言说立场与限度

陈廷柱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理想:价值取向及其言说立场与限度/陈廷柱
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3
(博士后文库)
ISBN 978-7-81125-126-5

I. 大… II. 陈… III. 高等教育—教育学—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52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cbsebs@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纪丽真

电 话 85902342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目 次

绪论 老调重弹的理由	(1)
一、痛苦的转变	(1)
二、现实的促动	(3)
第一章 大学理想研究的转型:从本质主义到价值分析	(10)
一、回到柏拉图,也说“理念”与“理想”	(10)
二、传统大学理想的主要话语及其来历的方法论分析	(20)
三、用本质主义方法构建大学理想的局限性	(41)
四、敢问路在何方	(59)
第二章 自由与大学的理想	(69)
一、自由何以成为大学的理想	(69)
二、自由的立场与限度	(90)
第三章 忠诚与大学的理想	(100)
一、忠诚何以成为大学的理想	(100)
二、忠诚的立场与限度	(123)
第四章 卓越与大学的理想	(130)
一、卓越何以成为大学的理想	(130)
二、卓越的立场与限度	(151)
第五章 平等与大学的理想	(167)
一、平等何以成为大学的理想	(167)
二、平等的立场与限度	(194)

第六章 大学的理想在于整合多重价值	(203)
一、德国大学的经验	(203)
二、美国大学的经验	(214)
三、最后的忠告：别把理想寄托于某种价值的最大化	(234)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4)

绪论 老调重弹的理由

时过境迁,大学理想、理念或精神等这些当初炙手可热的话语转眼间就成为颇多高等教育研究者不屑一顾的东西,原本是大学自身不可或缺的事物,缘何遭遇如此尴尬的命运?是说的人太多?还是说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本研究重弹老调意在何处?能否弹出一些新的声音?能否弹出一个满意的结局等?要做的事情不一而足,这里权且对选择这样一个并不时新的研究题目的理由作些解释。

一、痛苦的转变

顺着博士论文所走过的研究路径,我设想着进一步揭示理想主义的教育观点是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发挥作用的。那时候有一种朦胧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为理想主义在教育中应该是占第一位的,对大学理想的诉求也就是将超越现实的、有点类似于牛虻精神的某种信念转化为大学中人的理性自觉。大学中人一旦有此自觉,大学便有了一道无形的边界,这道无形的边界可以化解大学自主与社会干预的矛盾,大学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大学也就不担心被指责为是公司、学店、养鸡场、文凭工厂,抑或是什么别的了;大学中人一旦有此自觉,规范化管理与学术自由之间的潜在冲突就能够有效地加以协调,大学当局也就用不着想方设法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了,大学教师也就不会对学校的条条框框吹毛求疵了。大学是个特殊的地方,负有特殊的使命,大学教师是特殊的人群,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行为心役”的管理假设,将大学的理想建构在学术与教育的乌托邦中,任何逼迫大学符合“有用性”、“有效性”的想法与措施都是对

大学理想的玷污。

在我真正介入大学理想研究的行列之前，直觉告诉我：如此之多的人在研究“大学的理想”，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大学的美好蓝图应该已经绘就，我诚以为我所能做的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只限于在设定的理想与具体的实践之间寻觅两者相互作用的途径与机制。但随着我对众多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更多的了解以后，却发现研究者在如何设定大学理想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方法论局限。于是我开始怀疑：大学是什么的问题是否是一个假问题？对于大学是什么的追问能够担当得起重构大学理想的复杂使命吗？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种研究起点及其后续浪漫化的设计，却成了当前大学理想研究的学术霸权（或者说是集体潜意识）。也正是因为过于迷信大学之道（逻辑、理念、理想、本质）的合理性，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观点或多或少总是与国家的需要相背离，这种“背离”似乎已经成为学者精神与学术价值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

对大学发展取向的非功利主义诉求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探究大学理想的基本标示，当然有其历史的经验、现实的基础和理论的合理性。在本研究中我将继续肯定大学的非功利价值观及其对大学发展的意义，但是我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国家、政府或大众越是需要大学贡献自己才智的地方（实际上大学也是在想方设法满足这些需求），大学理想主义者越是排斥它？大学理想的呼声是在企图超越什么？还是在表达某种被压迫的愿望？笔者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大学理想问题的框架。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不警惕大学理想研究过于浪漫化。大学存在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把大学某些方面的价值绝对化，并使之成为大学理想的全部，这种主观的、情绪型的建构大学理想的方式有待全面的审查。我们不能盲目跟在洪堡、纽曼、蔡元培、弗莱克斯纳等伟人后面人云亦云。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理想化”。

很奇怪，对我原来所敬仰的“大学理想”在我探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却开始产生怀疑，以至于想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词——

“终结”！无论是从应然、还是从实然的意义上来理解大学的本质，都不足以构成大学采取理智行动的依据。更为紧要的是我们应该问一问：难道大学所追求的就是像个“大学”吗？“大学”又是什么？难道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大学母本？听一听亨特(Ian Hunter)是怎么说的吧！

几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懂得以“大学之道”为题，发表一场演讲。但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自愿出席听讲，因为大部分类似的讲题及相关的论文，都只是在重复惯用的社会辞令，很少会提及具体运作的内容。人们费神思量什么是大学之道的应有标准，但这些努力往往只会提出既没有意义又含糊不清的目标。^①

二、现实的促动

本研究的主要轮廓与想法是在 2003 年定型的。2003 年对人类历史来说应该是极不平凡的一年。3 月 20 日，未经联合国的授权，美英联军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还未平息，另一件更使我们揪心的事情席卷而来：“非典”在中国以及海外许多国家及地区扩散和蔓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可以说，大学是大学，战争是战争，瘟疫是瘟疫。这种估计如果成立的话，我把大学理想研究与两者联系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曾记否？1957 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令美国朝野上下震惊，促成了美国人对教育的大反思。美国人很聪明，也很有远见，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教育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怎样办教育涉及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美国人没有深度，没有风度，特注重实用，为一些思想家所遗弃。在这方面，犹以英国人为甚。可看看伊拉克战争，布莱尔跟在布什屁股后面唯恐被撇下。战争开始了，布莱尔还躺在床上睡大觉，半个小时之后才被告知。英国人有深度，也有风度，特注重心智，结果怎样呢？狐假虎威，梦想着以前英美之间的殖民地关系而自慰！面对美英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的高科技

^① 亨特：《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载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55 页。

战争，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有何感想。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1998年第4期《方法》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向“牛津”的牛津致敬》的文章，该文作者写道：

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底——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文史哲数理化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状况，教育界官员们还拍手称快，其短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一个文化人，笔者也渴望大学成为文史哲数理化等人文与基础学科的一统天下，甚至就像柏林大学初创时期那样，把哲学奉为至尊。可是我们都见证了国际间弱肉强食的战争，同许多人一样我也期待着阿拉伯人的信仰、两河流域的文明、国际社会的正义能延缓战争的进程，甚至是瓦解美英的企图。然而事实是无情的，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美英联军的高技术装备横扫了一切关于信仰、文明和正义的神话，而且也看到了文明古国的子孙们趁火打劫、投敌叛国等一幕幕不光彩的电视画面。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之中，作为国家智力依托的大学还能无动于衷乎？也许我们需要重温洋务派与保守派在京师同文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思想，随后在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1861年清政府应恭亲王奕訢等人的要求，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批准在这一机构之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开办，始设一个英文馆。1863年，又开办了法文馆。京师同文馆起初作为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专门培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译员，虽然在挑选教习的问题上受到一些制肘，但并未受到保守派的刻意攻击。京师同文馆开办四年之后，洋务派官员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和算学馆，以造就科技之才。1866年12月，奕訢等人再次上奏朝廷拟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和算学馆时，保守派再也无法保持克制。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便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请听他的说辞：“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

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①据张盛藻的考究，古往今来，凡记载有关做工的书中，都没有看到过做工的人要上什么学，更没听说过朝廷的官员也要学习做工的道理。他认为，只要朝廷整顿军纪，严明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款，便可达自强的目的；朝廷应注重培养国民的气节，只要臣民同仇敌忾，“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倭仁以其显赫的身份成了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和算学馆最大的障碍，他在奏折中写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只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勿论夷人诡譎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以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②

毋庸讳言的是，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均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人文主义的传统，走上了一条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互动发展的道路。1988年7月澳洲政府就业、教育及培训部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旨在促使大学以及学院的发展更好地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对于政府优先发展与高科技产业相关的学科，例如工程、电脑及资讯科学、商学研究及经济学、亚洲研究等等，各种不同的组织与团体均能够将自己的利益同政府的改革计划协调一致，而人文学院的教授们对改革计划却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针对政府把高等教育的目的贬为只是迎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文学院的回应是：高等教育应把追寻人性的至高价值、培育“完人”和不计实利地追求学问定为自己最崇高的目标。^③其实，我们今天大学校园中充斥的“理想主义者”的长吁短叹并不比澳洲大学里人文学院教授们的论调高明多少。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充分汲取了我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问题肯定是有，但还不至

①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②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③ 亨特：《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载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7页。

于按照西方浪漫主义的大学理想进行彻底改造。文化的底蕴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能使一个国家富强的最直接的力量还是科技。战争打响了,博物馆的文物不能复活为一种战斗力量;国际正义呢?武器核查工作不仅没有阻止战争,还通过抑制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与生产,销毁较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间接的军力侦察与评估等途径,无意中充当了一回帮凶的角色。

有人也许会说,巴勒斯坦频频发动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性袭击,不也说明精神的战争价值吗?我想,宁可让我们的国民在像以色列的军队在巴勒斯坦长驱直入或美英联军想打伊拉克哪个地方就打哪个地方那样的情境中激发忠爱,培育信仰,也不能完全仰仗精神食粮来保家卫国。联想到一些高等院校开展的爱校教育,学校业绩平平,学生饱受就业之苦,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爱校之心何以成为可能。其实国家的感召力、凝聚力也是如此。国家是一个人生存的物理场域,也是一个人生存的精神家园。如果同样生活得富裕,如果同样生活得有所成就,如果同样生活得体的面,谁都会渴望成为一个有国格、有人格的人。人的许多素质,特别是向善的、情感的方面,不完全是由教育规训而成,而多半取决于其个性化的境遇。美国人在国外受到威胁的时候,经常拿“我是美国人”来吓唬人,至于效果如何,应该视事情发生的国家而定,可国家的强盛对塑造美国人性格的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尊严而死固然悲壮,但是国家孱弱到使自己的国民承受苟且生与殉国死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让信仰、文明、正义等精神性的东西远离,而是提醒大家注意:没有国家的强大,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居住权都无法保障,更何况幸福美好的精神性生活。

波普尔的“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痛苦”的话语,值得我们文化人深思。国家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如果说文化,国家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文化;如果说自由,国家就是我们享有自由的最后依靠力量;如果说精神,服从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向度的重要表现;如果说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最根本的平台。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当代大学最基本的使命,也是我们当代大学最崇高的理想。

之所以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是要表明我与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大学理想彻底决裂的态度,我无意否定大学进行人文学科和人文精神教育的价值,问题出在浪漫主义的大学理想被我们今天的研究者非理性地继承下来,成为一种学术霸权。同时也得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说标示着传统大学理想的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是逐步衰落的话,这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今天说今天的大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不及以往的话,这将是一个错误。大学在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收益也颇多。虽然无法同工程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甚至也逊色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还是从大学不断获取的名目繁多的经费资助中分得了相应的份额,较之其高傲而贫乏的历史,条件还是好多了。人文学者学术交流之频繁,人文学科出版刊物之便利,无不可以为证。这种情况特别容易使人回想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人文主义者是否还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平等乃至优越地位而清贫乐道乎?人文主义者长期战斗在人类精神的高地,他们的精神境界或许可以使他们免疫于物质世界的诱惑。但是,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大学如果还只是沉溺于自己的文化理想,那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家。大学是生产知识的母机,是高科技的孵化器,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这样说决不过分!当然,我这也是拾人牙慧。如亨特就这样说过:“人文学科这样公式化维护自己的做法,已有点儿使它们无法真正反省和检讨那些支配着它们的因素和力量。把人文学科认定为只求培育完人和不计实利地追求学问,或可使其逃离政府管治(的范围),但却同时有自外于历史的危险。”^①

与伊拉克战争相比,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更为全面地影响着我们对教育的反思。在当代的社会思潮中,有两点尤为引人注目:一是对科学技术与理性的批判,似有将科技与理性同人

^① 亨特:《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载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0页。

性、人文、人道对立起来的架势；二是对组织与制度的批判，似有将组织与制度同人性、人文、人道对立起来的倾向。这两点同样反映在大学理想研究的主流意识之中，用人文以救科技之弊，用意义建构以补理性之偏，用自由以抗衡组织干预，用精神以超越制度约束，诸如此类的主张或潜在设定听起来确实铿锵有力，切中要害。而在我们与“非典”抗争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道理是：

(1) 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依靠科学技术及时地使人类减少和免于灾难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任务；

(2) 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干预仍是人类解决重大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和根本途径，对家庭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自我约束意愿和能力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成人”教育的主旋律。

大学与人类的美好生活、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当我们在评判或建构大学的理想之时，仅仅想到大学是什么，抑或是大学应该是什么，抑或是洪堡、纽曼等是怎么说的，抑或是依据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什么主张，等等，岂不辜负了大学的神圣使命。说得轻松点，大学理想研究是在进行学术活动；说得严肃些，大学理想研究是在为大学谋划未来。我们岂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是以来某学科之私利而置大学的生存与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不要以为言说立场是不可究诘的，真正的大学理想范本并不像我们有些学者从某一立场出发把问题推向极致，而是协调各种各样言说立场的产物。从现实与传统大学理想研究观点的冲突与碰撞中，我终于从中悟出：应该全面地从大学所触及的价值关系出发，按照多元的大学理想这一思路，重新审查与重构大学的理想。

选择了这样一个让人“心灰意冷”的研究课题之后，却意想不到地碰上了北京大学在2003年5月公布《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而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这次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出乎意料地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①。在议论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中，呼声较高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也如是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校内校外，这么多人都来

①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李强语，见《读书》2003年第9期，第34页。

关注北大的改革,并进而讨论所谓的‘大学之道’,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一点,对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将起很大作用。”^①《视界》主编李驼也这样认为:“我觉得,改革的关键还是大学的理念。”^②

北京大学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层面的改革方案,怎么可能与老生常谈的、“虚无缥缈”的大学理念问题纠缠在一起呢?柏拉图曾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三种技术,即使用者的技术(运用理念进行思考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将理念还原为事物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柏拉图认为,模仿者关于自己模仿的优劣,既无知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也无意见(对实在影像的认识);而制造者只能有正确的意见,不可能理解事物的理念。^③关于任何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及其终极性评价,唯有在最高法庭——理念世界——才能有个最终的说法。“与国际接轨”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似有模仿之嫌,所以诉求于理念的裁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去对此寻根问底,只是想说:大学理想是高等教育学科任何时候也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它使人望而生厌,也使人痴心不改!

① 李强、陈平原等:《大学改革,路在何方》,载《读书》2003年第9期,第38页。

② 李强、陈平原等:《大学改革,路在何方》,载《读书》2003年第9期,第44页。

③ 参见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8页。

第一章 大学理想研究的转型： 从本质主义到价值分析

在概念上何谓“大学的理想”？通过哪些材料来表述“大学的理想”？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大学的理想”？应该说这种三部曲式的研究是一些论文或著作所惯用的思路。寻求一种关于大学理想的终极真理，或者说把自己关于大学理想的某些意见上升为普遍性的绝对观念，已经成为大学理想研究群体的集体潜意识。缺少分析与建构大学理想的方法意识，不关注自己建构起来的大学理想的价值依托及其局限性，是当前大学理想研究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回到柏拉图，也说“理念”与“理想”

我在“绪论”中已经表达出对当前我国关于大学理想研究的基本看法，此处再次明言“当前大学理想研究不尽如人意”，在缺少学术批评氛围的情况下，也许抛出圈外人士的批评更有说服力。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王乾坤教授在写作《大学的自足与自律》一文时，面对社会需要对大学的诱惑与压力，自叙“为了不致太落伍，曾想寻一些有关新思维的教育学著作读一读，然而不果，只好胡想”^①。王教授所言“不果”，是找不到相关的研究资料呢？还是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自己的感受是：从事了多年的“高等教育研究”，似乎也只是在做些人云亦云的工作，某人的大学理想知道得不少，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情况也能略说

^① 王坤乾：《大学的自足与自律》，载钱理群等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6 页。

一二,可真正碰上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所激发的思想交锋,我才发现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因为我们从不大关注自己言语背后的立场与根据,当北大改革“与国际接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到质疑的时候,习惯于“引以为证”的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处于无话可说的地位。

王教授首先“胡想”到的是什么呢?内容如是:“大学应该是什么呢?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有自己的终极因或目的因,那么大学也就应该有自己的终极因。”^①可贵的是,与我们传统的大学理想研究者相比,王教授尽管同样提出了“大学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但他接着想到的不是纽曼、洪堡、弗莱克斯纳、蔡元培、梅贻琦等等主演大学理想的重量级人物,而是把亚里士多德老人给请了出来,把裁定大学言行谁是谁非、何去何从的终审权奉送给决定大学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这其中的高明之处自不待言。然而遗憾的是,王教授既然看到了方法论立场在研究理想大学中的重要性,但不知为何又落入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的俗套。要寻找本质主义的理论基石,亚里士多德当然是首选人物,但推及传统形而上学的渊源,特别是将大学的“本质”与大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妨直接去请教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先生,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地地道道的本质主义的杰作。回到柏拉图,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本质、理念、理想是如何发生联系的。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纽曼的著作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对纽曼的著作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都不陌生。我们所接触到的中文译著多把它译为“大学的理想”,可是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缘何变成了 *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 是翻译上的错误?还是为了尊重传统的译法?抑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没有人问个究竟。有人在翻译上找根据,借鉴知名人士的译法确实可以缓解不求甚解的压力,但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需我们继续追问。

① 王坤乾:《大学的自足与自律》,载钱理群等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类似的情况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苦心经营的“城邦的理念”，结果我们也把它理解成“理想国”。看来，从“理念”入手进而窥视“理想”，我可是命中了要害。

（一）柏拉图的“理念”是什么？

柏拉图的“理念”，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实体存在；不是一个现象世界的物理存在，而是一个观念世界的“虚拟”存在。如何理解这个“存在”自有一套特别的语境与程序。

柏拉图认为存在两个世界，即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两个部分：实物（一切自然物以及全部人造物）及其影像。可知世界也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灵魂把可见世界中的那些本身也有自己的影像的实物作为影像；第二部分则是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第一部分思维的工具是可见世界实物部分的影像，第二部分的思维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两个部分的研究都只能从假设出发，但在第一部分，假设就是原理，是用来作结论的，就像几何学家、算学家把某些假设当作公理从而延续推理过程的道理一样。但在第二部分，假设仅仅被用作假设，即“被用作一定阶段的起点，以便从这个起点一直上升到一个高于假设的世界，上升到绝对原理，并且在达到绝对原理之后，又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以绝对原理为根据提出来的东西，最后下降到结论”^①。

遗憾的是，柏拉图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也自以为指出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光明大道，但他毕竟没有创造出另一个世界的话语体系（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原则性地区分了“意见”与“纯粹理性知识”的不同），所以我们还是得用经验世界的话语体系去勉强理解另一个世界的“实体存在”，其困难绝不亚于柏拉图用另一个世界的“实体存在”来解释可见世界万事万物的起源与衰变。

据波普尔的考证，柏拉图对理念的理解在不同的篇章中也有些出入：在《理想国》中，理念是僵化的，留下了不少“弄虚作假”、

^① 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0页。